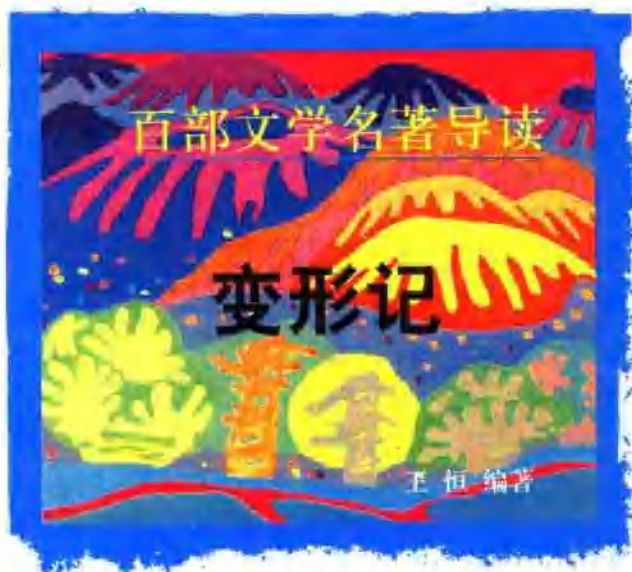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074
0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变形记》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变形记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飞 周晋文 徐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集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作者介绍〔1〕

作品赏析〔21〕

附录：变形记〔60〕

《变形记》导读

作者介绍

一九八五年，西欧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几家大报举办“已故欧洲十大作家”的评选活动。评选结果，奥地利作家弗朗兹·卡夫卡荣获第五名，仅居莎士比亚、歌德、但丁、塞万提斯之后，在入选的四位二十世纪作家（另外三位作家是托马斯·曼、普鲁斯特和乔依斯）中雄居首位。

对于卡夫卡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地位，捷克文

艺评论家米·荣曼有如下评论：“‘卡夫卡传统’的整个巨大混合体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帮助我们的文学克服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点展开来看就是：“今天几乎没有一篇德语小说散文不曾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受到他（卡夫卡）的影响”；“他对二十世纪英国浪漫派作家起了最强烈的影响”；他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先声”；当代美国文学“没有卡夫卡是不可想象的……”

何以天年只有四十一岁、一生孤寂、疾病缠身的卡夫卡，在他那默默无闻的生命逝去之后，会赢得如此崇高的声誉与评价呢？对此，卡夫卡作为一名作家，他的作品无疑将给以最完美、最令人信服的解答。不过，从来真正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同它的创作者生活的时代及个人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的。在进入卡夫卡笔下艺术世界探究奥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卡夫卡的生命之旅吧。

童年

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弗朗兹·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杂货铺店主。他魁梧强悍，精明能干，然而苦于自己是犹太人出身，不得不挣扎在布拉格社会的底层。随着儿子的出生，赫尔曼将满腔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指望他能叩开通往上流社会的大门。可是事与愿违，父亲的善于投机钻营和热衷追名逐利的品性在卡夫卡身上荡然无存，他明显地继承了母亲温顺、柔弱、敏感、羞怯的特点。

赫尔曼不能不看到，儿子身上缺乏卡夫卡式的生命力和

进取心，于是决定通过严格的教育使这个“胆小的孩子”成为一个“坚强勇敢”的人。父亲的教育方式与其说是严格，不如说是粗暴。他对卡夫卡动辄喝斥怒骂，蛮横地发号施令。在强壮凶悍的父亲面前，瘦弱胆怯的卡夫卡噤若寒蝉，先是变得“说话结结巴巴”，后来干脆“既不会思想也不会说话了”。父亲平时在店铺里对伙计们指手划脚，回家后就抽烟打牌赌钱，时不时数落孩子几句。而柔顺的母亲不仅不能公开袒护儿子，为他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还得在丈夫打牌时小心翼翼地上烟斗。在这样沉闷、污浊的家庭氛围里，在父亲“暴君”式的威压下，卡夫卡日益失去了自信和勇气，他身上懦弱孤独的气质与日俱增。这一结果自然与赫尔曼把儿子培养成材的愿望背道而驰。后来，卡夫卡在致父亲的长信中说：“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您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产物。”

时光走进一八八九年，六岁的卡夫卡被送进布拉格的德意志男子学校。赫尔曼选择这所德语学校，是为儿子今后的飞黄腾达作准备。学校的环境灰暗郁闷，生活平淡乏味，毫无生气可言。学生课间休息时就呆在教室里或走廊上，无话可说，无事可干。尽管如此，校方似乎还嫌学生不够谨慎持重，在走廊两侧的墙上以“说话是银，沉默是金”的教条来训诫这群缄默的“鸟儿”。

学校的生活这般压抑枯燥，上学对卡夫卡来说本身就是件不愉快的事，偏偏陪送卡夫卡去学校的女厨师又是个促狭的女人，她威吓说要把卡夫卡在家淘气的种种表现告诉老师。卡夫卡怕极了，不敢去上学。女厨师的威吓不过是说说罢了，她从未真的告过状。但是一个六岁的儿童哪里看得清这些？最令他感到恐惧的莫过于在家刚受了父亲的责骂，在校又因女

厨师的告状再遭老师的惩罚。他每天琢磨着，“她昨天没告我，今天一定会告的”。这种持久的精神折磨是一个孩子难以忍受的，它无疑给卡夫卡原本就不幸的童年又掺进了一剂苦药，致使他三十多年后仍对此记忆犹新，难以释怀。

作为犹太人，卡夫卡从小就敏锐地感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对这一种族的压力。在他生活的时代，捷克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街巷冲突和骚乱谋杀时有发生。在布拉格，犹太人以自己的精明勤勉几乎垄断了全市的商业、金融业和报业，于是排犹分子就利用人们的嫉妒心，煽起了反犹烈焰，而说德语的犹太人尤其成了捷、德两族人冲突的替罪羊。即使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校园也受到冲击，卡夫卡后来的朋友奥斯卡·鲍姆就是在一次冲突中失去了双眼。家庭生活已使卡夫卡苦闷沮丧，外部世界的动荡更令他惊惧不安。

卡夫卡的童年，恐惧与孤寂相伴，痛苦与屈辱同行。童年在卡夫卡的记忆里是灰蒙蒙的黑白的断片：父亲的粗暴，母亲的隐忍，女厨师的恫吓，学校的压抑……这一切梦魇般地压在幼年卡夫卡的心头，令他无法摆脱。于是这个敏感的孩子日益孤僻、怯懦和自闭，谁也无法看透他沉思冥想的外表下所掩藏着的内心世界。

中学时代

在布拉格老城的环境马路旁边，矗立着一座巴洛克建筑，这就是金斯基宫——奥匈帝国国立德语文科中学。它不仅是德语学校，而且是当时王朝招贤纳士的地方。由此不难看出，赫尔曼送儿子进金斯基宫确是一片苦心。

卡夫卡就是在这座庄严肃穆的建筑里接受中学教育的。学校的校规是等级森严的奥匈帝国式，沿用因袭数十年，虽早已陈旧腐朽却仍顽固地束缚着学生。师生之间的接触几乎为零。老师高贵尊严，是那么远不可及，高不可攀；学生的本分除了对老师无条件的服从外，便是循规蹈矩地死读书。学校为了压制学生的兴趣爱好，规定老师每年填写报告，编订“语法例句汇集手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从家里带来的想入非非”的学生。在这里，思考力和判断力是学校最大的敌人。只要看一眼学校编排的课表，就可以了解学校是如何禁锢学生的天资和想象力的。枯燥无用的希腊文和拉丁语几乎占去了课时的一半。为了应付考试，学生们才不得不死记硬背，学习全无兴趣可言。历史课、德语课被当作副科，至于外语、音乐、美术、体育等则只是作为选修课点缀课程表罢了。教师上课全是照本宣科，传授的知识“不超出学校规定的材料”。因为在金斯基宫，学生既不需要启迪联想的材料，更无需联想的能力。

“就我的体验而言，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无不在竭力抹杀着个性。”这是卡夫卡对中学时光的总结。“我的个性不被承认……我从未从自己的个性中得到丁点儿好处，即我从来没有持久的自信心。”但卡夫卡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因为对自己缺乏信心，他非常卖力地学习，虽然他对学校设置的课程丝毫不感兴趣。在文科中学的八年里头，卡夫卡的成绩在班上出类拔萃，老师对他颇有好评。但谁也感受不到这个沉默寡言、温和平静的男孩内心的自卑和忧虑。卡夫卡老“想着自己肯定通不过高级中学的考试，这次居然成功了；可又想着到了高中一年级后，必然要败下阵来……”甚至晚上睡

觉也梦见“教授们云集一堂，对我这个闻所未闻的特殊情况进行火力侦察；他们要查出我这个最无能、最无知的学生怎么会偷偷溜进了这个年级来的。……不仅上课，而且在这决定性的年龄所遇到的一切事物——使我感到就像一个侵吞公款银行的职员一样，胆战心惊怕被人发现……”这种自卑心理伴随了卡夫卡整个中学阶段，直到中学毕业考试结束。本来这个学业优秀的学生完全可以正常通过毕业考试，但他还是作了弊，生怕自己通不过。这种自卑感使卡夫卡对周围的环境保持着距离。他的同学乌蒂茨后来这样评价他：“他总是那样整洁、朴实，不引人注目，安分守己……我们都很喜欢他，尊重他，但是从来不能和他亲密无间。他周围有一道玻璃墙壁……他以文静可爱的微笑打开了通向交往世界的大门，却又对这个世界锁住了自己的心扉。……他身材修长，颇有孩子气，文质彬彬，和善可爱，他坦率地承认任何别的东西，却始终以一种方式保持疏远和陌生。”这个时期的卡夫卡已显出与外界隔绝的倾向，因为“学校和父母都不能容忍我的个性。我所受到的教育是要让我脱胎换骨，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对此卡夫卡感到困惑，他认为“不弄清现实事物的现实状态，前进便是纸上谈兵”。这种先认识再前进的态度不久便使他中断了与外界的交往，久而久之也习以为常了，甚至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希望过上心醉神迷的孤独生活”。

“孤独圈中的孤独点”，这是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的坐标点。文学正是少年卡夫卡在孤独的海水中挣扎时抓住的一方浮木，或者说文学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从那儿可以暂时逃离压抑着他的“生活的重负”。他的文学尝试始于一八九七年至一八九八年间。早年习作文风浮华，追求词藻的堆砌，卡夫

卡对此是不满意的。在粗砺的社会环境里，这颗文学的幼苗显得那么纤弱无助。一次卡夫卡到外祖父家作客，抽空写下了已构思好的一部小说的片段，当大伙围坐一块时，一个爱开玩笑的舅舅突然从卡夫卡手中夺走了那张纸，匆匆瞟了一眼，就把它还给侄儿，当着众人的面说道：“一个破玩艺儿。”舅舅的话如“一记重重的巴掌”将想在写作中寻求慰藉的少年“逐出了人群”。

人们大都生活在矛盾之中，卡夫卡也不例外。这个被“逐出了人群”的少年既想彻底封闭自己，又渴望着参与集体生活结交朋友。对孤独不幸的人来说，友谊本来就是一剂贴心的药。在卡夫卡看来，“人们彼此是用绳索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断了，他就会跌入无底的深渊，“因此每个人都得牢牢抓住其他人”。于是卡夫卡“抓住”了奥斯卡·波拉克。波拉克热情开朗，有思想有主见，成熟练达，使卡夫卡钦佩不已；而他对这位拘谨羞涩的同学也颇有好感。卡夫卡还把自己创作的手稿给他看，请他提意见。通过波拉克，卡夫卡开始阅读当时的学术杂志《艺术珍藏》，受益匪浅。在文科中学后期和大学前两年，波拉克是“玻璃墙”里的卡夫卡与墙外生活相系的“绳索”，是他观察外部世界的“窗口”。不幸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波拉克开始疏远自己的朋友，“友谊之窗”渐渐关闭，这使卡夫卡非常苦闷。在一次讲演练习课上，十八岁的卡夫卡选择的题目是“如何认识歌德的《塔索》的结尾？”讲演者选择此题目自有他的深意：塔索被众人当作乞丐驱逐和流放，他向朋友安东尼奥告别时说道：

我用双臂依依搂抱着你！
恰似那水手依然紧紧地扒在

那悬崖峭壁上，到终会落得个粉身碎骨下场。

就在卡夫卡为朋友的远离而苦闷，为再次遭“放逐”而伤心的时候，身后另一扇友谊之窗正悄悄朝他打开。他，就是马克斯·布洛德。

大学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卡夫卡在布拉格—卡尔德文大学注册入学，开始了大学生活。作为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卡夫卡在选择专业时极受限制，而他自己优柔寡断的个性在这时也充分体现出来。由于父亲激烈反对他学哲学，他就读了化学。但实验室的工作实在不合他的胃口，两星期后他便转到法律系。在应付同样枯燥无味的法律学习之余，他开始听艺术史和日尔曼文学史。卡夫卡对文学史很感兴趣，可教授文学史的老师一副种族主义的论调令卡夫卡很反感，于是他萌生了到慕尼黑继续学习文学史的念头。这次仍是由于父亲反对未能成行。卡夫卡只得在布拉格重拾法律课程。

大学毕竟与中学有所不同，卡夫卡的生活相对丰富了不少。这个时期他参加了一些文学活动，如“读书与讲演之家”和“布兰塔诺沙龙”。在这些活动中，他非常认真地倾听别人的意见，自己也经常发表看法。正是在“读书与演讲”活动中，卡夫卡结识了马克斯·布洛德，后者成为卡夫卡的终身挚友。两人都是文学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但一直都没留意过对方。在一次讨论会上，布洛德作关于叔本华的报告，高度赞扬叔本华，却把尼采贬得一钱不值，斥之为“骗子”。卡

夫卡在中学时就读过尼采的书，对他很有好感，于是当即决定要陪布洛德回家，以便路上好好辩驳一下这个狂妄的年轻人“过于粗暴的言论”。这以后，两个开诚布公的大学生就成了好朋友，卡夫卡在布洛德身上又找到了“友谊之窗”。他们每周见面两三次，借助词典，吃力地共读柏拉图的希腊文著作、福楼拜的法语读物。布洛德是最早发现卡夫卡聪明才智的人，就连卡夫卡这个人也强烈地吸引着他：“从他身上爆发出了某种全然超乎寻常的、我终身再未遇见过的强大力量，就连我见过的那些德高望重闻名遐迩的人士也无一可与之比拟……他不讲一句言之无物的空话。他谈论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自然，而且他别具一格的观察方式也是可贵的，他远远地抛弃开自命不凡或玩世不恭的态度，以独特的方式观察着，只要他在场，平日的一切在变化着，一切给人留下了犹如初次看到的印象，使人感到新鲜，且往往以一种令人悲伤以致于让人沮丧的方式显示出新鲜。……这个人本身就给我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印象，而且很快就被有名望的人士看作有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尽管他的言行举止总是那么的拘谨腼腆。”卡夫卡同样珍视这份友情，正如他后来在给布洛德的信中写道：“你知道的，我对你的爱胜过了爱我本人，比蕴藏在我心房中的爱情还要多。”

除了“读书与演讲之家”，“布兰塔诺沙龙”也是卡夫卡时常光顾的地方，它是布兰塔诺学说的崇拜者的定期聚会。卡夫卡对布兰塔诺的理论也很感兴趣。布兰塔诺强调，人要进行自我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前提。卡夫卡在一九〇四年第一次剖析自己时说：“我们像鼯鼠一样去检查我们自己，当我们最后从隐蔽的用沙土造的地窖里走出来时，都蓬头垢面，

污迹斑斑。”“自我判断是判断的前提，判断乃是正确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的基础。”为确定这一基础，卡夫卡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后期的作品中，卡夫卡多以审判、判决、惩罚为主题，可以说与布兰塔诺哲学不无关系。

在这一时期卡夫卡专心致志地读了大量日记、传记和信札作品。黑格尔的文笔优美、质朴、不失幽默，对卡夫卡的讽刺幽默和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发生过影响。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引起卡夫卡的共鸣。陀氏是个“残酷的天才”，他善于“布置精神上的苦刑”，这种“残酷”在卡夫卡的《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卡夫卡非常推崇歌德，他在读有关歌德的著作时，“浑身都在兴奋激动，任何写作都被止住了”。这时，卡夫卡开始创作短篇《一次战斗的描写》，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卡夫卡最早的作品。

双重生活

1. 职员与作家

一九〇六年六月，卡夫卡通过博士学位考试，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随即，他到法院实习了一年。实习期间，他耳闻目睹到奥匈帝国司法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为他以后创作《诉讼》（又译作《审判》）和《城堡》等作品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实习结束在即，卡夫卡面临就职的选择。还在法院实习时，卡夫卡就对这个行当毫无好感，因为他的志向是“献身于文学使命”。后来他在日记里写到：“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然而现实是，卡夫卡必须有一份能带来固定收入的职业，获得经济独

立。一方面，作为长子的他深感自己有义务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另一方面，卡夫卡虽然对文学情有独钟，却缺乏作家的自信力。他认为自己的写作进程缓慢且不稳定，加之风格独特，恐怕不能赖以谋生。何况，父母正积极地在外活动为他谋职。一九〇七年十月，卡夫卡到普通的保险公司做职员。对此卡夫卡无奈地自我解嘲道：“为了这个世界，你可笑地给自己套上了挽具。”保险公司职员卡夫卡是多么希望能“挣断皮带”在广袤无垠的文学原野上“毫无负担地欢乐驰骋”啊！

从进入保险公司的那一天起，卡夫卡的生活就被撕裂成两半——普通职员和业余作家。在公司里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并由于“卓越的制订计划的能力”而深得上司的赏识。另一方面，职员身份跟他的写作兴趣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使他痛心疾首，为之苦恼了一生。他在一九一一年的日记里就这样慨叹：“从表面看，我在办公室里是克尽职守的，但我并没有克尽我的内心职守（即写作——笔者），而一件没有完成的内心职责却在我身上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幸。”因为把心血耗费在“办公室里那一堆毫无价值的文件上”，等于在他那具有“幸福天分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他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要摆脱它，看来只有发疯才是唯一的出路。”

卡夫卡白天是克尽职守的职员，晚上是勤奋的业余作家。他通常写到凌晨二三点甚至是清晨六点。他在苦恼就在于，如果某天晚上在家里写下什么好东西，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就会继续“激情中烧，什么也干不成”；而在那个“写十行字受十次打扰的办公室里”更是休想写点什么出来。

此外，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也令他难以忍受。父亲见他

对家里的商号经营不闻不问，只顾埋头写作，早就满腹怨气。一次，卡夫卡的妹夫到外地出差未回，父母就千方百计地劝说卡夫卡到妹夫办的工厂里照看监管。这对卡夫卡而言，意味着将剥夺他整整两周的写作乐趣。他绝望极了，竟然萌生出从窗口跳下去结束生命的念头。幸而布洛德及时了解到朋友的悲惨处境，说服卡夫卡父母收回了成命，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小职员卡夫卡就这样挣扎在职业生活与他的写作使命的夹缝中，他背着保险公司这个深重的“十字架”，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为止。不过，保险公司这个十字架毕竟没能征服卡夫卡献身文学的决心：“既然我除了文学啥也不是，而且不能，也不想成为别的，那么我的职业就永远也占据不了我。”

然而为了他的文学事业，或者说为了抵偿职业所掠夺的精力和时间，卡夫卡付出的代价之大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他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大牺牲，即把自己关闭在孤寂的世界里。职业生活既是不能放弃，那么他只有抓紧工作以外的时间侍候缪斯女神。创作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特别的坦率和献身精神”，而这些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似乎已经消失了”。有时“与别人交谈”也会影响写作的灵感和思路。卡夫卡是个文学的苦行僧，为了文学创作他不惜放弃友谊、爱情和婚姻，而投身于孤独的怀抱。在给未婚妻费莉斯的一封信中，他清楚具体地描述自己理想中的写作状态：“一张写字台，一盏灯，住在一间长长的、关严的地窖的最里面的房间里，这当是我最好的生活方式了。人家给我送饭来，总是在最外边的门后放下，离我的房间远远的。穿着睡衣去取饭——

这当是我唯一的散步了。而后我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慢慢地一边吃一边想，接着又马上开始工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呵！因为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苦心思索的。”为了从灵魂深处挖掘出作品来，这位“地窖居民”认为，光是隐居还不够，“而是要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里拖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事实上，为了创作，卡夫卡确实过起了孤独自闭的生活，“现在，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一切跟文学无关的东西都让我痛恨；与人谈话使我无聊，会客使我无聊，我的亲戚们的痛苦与欢乐使我无聊。”

卡夫卡一生在正式职员与业余作家的双重身份下苦不堪言。为了钟爱的文学使命，他只有在职员生活之暇，以孤独为手段为自己营造一个狭小的空间，暂时陶醉在写作带来的安宁和幸福中。

2. 婚姻与写作

卡夫卡的不幸除了身兼职员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尴尬外，还有他传奇而失败的私生活。同普通人一样，卡夫卡也渴望爱情生活，娶妻生子，享受正常人的正常生活。他向往婚姻，羡慕“整个婚姻幸福的千姿百态”。然而，这么一个感情强烈、内心世界丰富的人为什么会终身未娶呢？卡夫卡生前与两位姑娘先后三次订婚，三次解约。他的最后一次订婚因父亲的门第观念而告吹。而前两次都是与同一位姑娘费莉斯·鲍威尔：一九一二年他们在柏林认识，一九一四年五月底订婚，同